



“食在广州”的王牌

江冰



广州正在准备“十五运”，紧锣密鼓，少不了清点自家文化品牌。说来道去，“食在广州”是城市最大的一张名片。谈食在广州，千头万绪，一时不知从何谈起。但我觉得第一张王牌就是广式早茶。

老广饮早茶，外地人多不理解。以为茶水就不是饭，其实老广不但有从早上吃到中午的早饭，而且还有下午茶、晚茶。总之，早茶可以24小时消费享用，是老广饮食习惯最具特色之一。

可以说，广式早茶，是友人交流的最佳方式。比如环球贸易中心餐厅的虾饺与红米肠够水准，80分以上。位居广式早茶“四大天王”之首的虾饺，三只鲜虾，丰富饱满，挺一个“鲜”字；2016年才研发出品的红米肠，配料讲究，柔肠脆皮，馅料多味。更妙在早茶不一定早，中晚全天均可。百种点心、十道茶水，丰俭由人，足以养生。

你若开车去广州郊区或佛山，即便去乡镇村，也总会让你忘了城乡差别，不但城市化风貌抬眼皆是，饮早茶气象亦不亚于广州市区，早茶时间延续到中午下午的大餐厅，高阔若大礼堂。按我北方朋友的话说：有上百桌吧？饮早茶简直就是“波澜壮阔”！或许这也是广东气势，珠三角尤甚。

去名牌老店，比如东方宾馆，更可见识广式早茶的讲究与丰富。广式早茶“四大天王”之外，鲜虾腐皮卷、榄仁甜肠粉、东方香茜饺、东方皮蛋酥让人印象深刻，不但外形“抓眼”，味道也值得回味。腐皮卷裹鲜虾，

腐皮的韧性，与鲜虾的质感交互，让味道更有提升；榄仁甜肠粉，外形靓丽，美感先声夺人，让人味蕾兴奋；香茜饺的饺皮犹如花边纸，一眼喜欢；皮蛋酥造型亦美；真系叉烧酥，包裹一整条叉烧，切段食用，仍感肉感充实；流心梳乎厘更让人吃惊，一个大球上桌，让我联想到在南京食过的炸球，但非同类，其完全用蛋清制作，切开似生日蛋糕，西式制法，孩童尤其喜欢。中西交融，加之建成于1961年的东方宾馆老店大店的风范，点心现做现炸，琳琅满目一桌，色香味均在85分以上，美不胜收，食客我早已折服而不问西东了。

早茶“四大天王”几乎各茶楼皆有：虾饺、干蒸烧卖、叉烧包、蛋挞。总之，各档次都有，价格亲民并不代表出品一般，虽不惊艳却很舒服。老榕树，骑楼街，粤剧私伙局，百年老店，共同构成了羊城老城区的独特气场。

不同早茶店，还有不同的保留节目。比如，鸭脚扎是经典粤式茶点，源自广州及周边地区，原为广府早茶中的“怀旧点心”。特点是鸭脚(或鸭掌)包裹着鸭肉、香菇、猪皮等食材，用腐竹或鸭肠扎紧后蒸制。20世纪中后期香港茶楼对此点心进行了改良，加入芋头、火腿等更多配料，反而喧宾夺主，让广州人误以其为香港原创。目前广州茶楼比较简便，腐皮包住鸭脚、香菇、芋头、虾合蒸，但缺少传统“扎紧”工序，失去了鸭脚与腐皮融合的味道。若论广式茶点融合之道，红米肠就是典范，肠粉与油条这两样构成双层皮，中间包裹馅料，

糯加脆的口感相得益彰，创新到位。

据老广食客明示：鸭脚扎是广府茶市“烧卖”之一，不是点心，点心与烧卖是有区别的，点心是以米粉制作的包点糕点为主。不过现在的酒楼茶室点心、烧卖都无分别称谓了。可见，“十三行”至民国时期，广式早茶就相当讲究了。

广报大楼喜糖餐厅，坐落于猎德大桥南岸，距广州塔不远。珠江边的早茶，有一份平凡中的卓绝不凡。广州传统点心咸煎饼被演化为油炸大球，让我即刻想到南京油炸球，上桌拍照后服务生切开装盘，构成餐桌的美学活动；紫薯饼参上西式面包屑，别一份口感；一碗白粥熬得稀烂，一碟一碗加上几缕菊花瓣——身份陡然一变：“玉满堂前燕”出处让人遐想，好似潮州帝王菜，文化赋予了其价值。此时造型美、抓眼球，食客已淡忘广州咸煎饼红腐乳的分量，以及其与糖水之佐配。艇仔粥领先，牛杂萝卜居中，猪红腐皮凤爪水角咸煎饼追随，羊城早茶满满传统气息。我期待一个场景：荔枝湾上小艇一只，有火柴灶小锅煮粥，渔妇装碗艇仔粥，一手付钱一手接粥，让我瞬间回到清末疍家妹卖粥的场景。

有人问：北京烤鸭、南京咸水鸭、四川担担面、重庆麻辣火锅、武汉豆皮、湖南臭豆腐、江西炒米粉、福建沙县小吃、兰州拉面、西安牛肉面等，为一地著名，而广州呢？我当即答道：广州就是因为美食太多，似乎无法一下子找到一个标志。但广式早茶就属于那个标志。当然，还有白切鸡、烧鸭、咕噜肉、龙虾、斑鱼海鲜种种，太多太多，眼花缭乱，数不胜数。

有人拍有广式早茶小视频，天花板价格，一千多元一桌，算开开眼吧。但依我经验，此乃例外，广州市民早茶价格大多亲民，物美价廉，物有所值。若一盘两件，几十元也可，多点四五样，两人上百元可以吃得很舒服。我的邻居冯婆就特别喜欢饮早茶，她说从小孩子饮到老，退休了天天早茶，就喜欢上茶楼那个欢喜气氛。来广州住一段时间，你就会知道：饮早茶，感受老广府店“平足靚正”——平价、量足、品靚，味正。尤其是马蹄糕与猪肉丸，看似寻常最奇崛，食材配方讲究，味道口感一流，好极！

电视剧《狂飙》曾红火一时，其中最让我有说话愿望的，仍然是食物。比如说，广东人喜欢吃粉肠、喜欢猪脚面、喜欢饮茶与吃早茶。但在这一堆广东人喜欢的食物中，有一盒饺子始终出来搅局，让我从头到尾略感不适。饺子属于北方食物，早茶里也有煎饺，但做法是广式的。

细论虾饺、干蒸烧卖、叉烧包、蛋挞，广式早茶“四大天王”，各得其味：虾为海味；干蒸烧卖与北方烧卖近似，但用料变化；叉烧包在北方包基础上融入广式风格；蛋挞就是西风热烈，亦体现食在广州的三种文化交融：北方中原、岭南本土、海洋外来。

看到广州番禺一人的小视频，说到广式早茶“四大天王”，一时感慨万千，联想到无数地方文化标志的早餐。比如童年时福州的锅边糊，年代久远，印象已经模糊，但广州一碗藕粉瞬间勾起回忆，如今新城区已难见海鲜藕粉，西关有，城太大，隔着天河、越秀，有点儿远。前年去上海，专程寻找菜饭团，寻常早点却成地方标志矣。我特别希望在以广东岭南为题材的大众传播中——比如影视剧——大力宣传粤菜粤食，打好“食在广州”这手牌。文至此，尤其羡慕电视剧《繁花》，将本地小吃宣传到位。那位汪小姐就是最爱菜饭团，把家乡美味宣扬成出神入化的“神仙味道”。不仅是汪小姐的最爱，更承载了上海人亲切、日常的情感。

据说，如今有广式早茶名店已开到上海、重庆、门庭若市，日日爆满。上海的朋友说，光看看上百件点心都大饱眼福了，何况，还大饱口福。（作者为广州岭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广东财经大学教授）

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灵魂与历史文化的积淀。每一个地方的博物馆，都是一个地方文化历史的集中体现。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到一个地方，我都会去那里的博物馆看看，以了解那里的历史文化。

在博物馆里，所有的文物，无疑都是历史的见证者。十年前，在浙江省博物馆，钱塘地区出土的玉璧、玉琮、石钺、青铜矛、纺轮等一件件珍贵的宝物，静静地躺在展示台中。我尽量放轻脚步，慢慢地走过它们，偶尔发现对上了眼缘的，就会静静地站上几分钟，仿佛有一段历史岁月，舒缓地重现在眼前。不经意间，我听到了关于钱塘地区良渚、上山等遗址稻谷灰化石的介绍。在钱塘这一鱼米之乡，其尤令我感兴趣。这说明，钱塘种植水稻的历史极为悠久，且可追溯至史前文明之时。

世界上，中国是最早驯化水稻的国家之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上山文化(距今约一万年)和河姆渡文化(距今约七千年)为稻作起源提供了实证。中国的水稻史，也是中华文化的发展史。

因为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水稻现今已是全世界栽培面积最广的粮食作物之一。无论是广袤无垠的亚欧大陆，还是热情狂野的非洲大陆，可以说只要有人类生活的地方，就几乎都有水稻的生长。但凡能种植水稻的地方，首先会给人“水乡”“富足”的印象。

似乎印证了这一点，中国的水稻最先产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南方。在古籍中，有关稻作的记载可追溯至传说中的神农时代，而《管子》等战国文献进一步记载了五谷的重要性。唐宋以后，稻米逐渐成为五谷之首。稻米，从那时起开始成为中国最常见的主食，并与来自西域的小麦一起，构成中国人饭桌“南米北面”的基本格局。

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更促进了南方水稻生产的迅速发展。到了唐、宋以后，南方一些稻区进一步发展成为全国稻米的供应基地。

唐代韩愈称“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南宋时期，民间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至明清演变为“湖广熟，天下足”之说，这一切都充分反映了江南的水稻生产，对于供应全国粮食需要和保证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性。

稻米文明由此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源泉，水稻农耕文明与早作农耕文明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史。

不仅如此，水稻这种本土作物，还因为袁隆平院士，有了“达则兼济天下”的气魄。

1964年，袁隆平院士开启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今天，在他与一代代农人的努力下，中国已培育出超过7000个杂交水稻品种，增产稻谷近9亿吨(截至2023年数据)，中国杂交水稻也走向世界，在60多个国家试种或推广。

而水稻的发现，则来源于先民对恶劣环境的抗争。

杭州地处南方，这里在山海之间，水网密布，季风气候带来丰沛的雨热，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之自古就是稻米之乡。这样的地理环境，也同时潮湿多雨、水患频发。《史记》里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

而筚路蓝缕的江南先民们，却在沼泽中发现了一种喜湿喜热、对土壤不算挑剔的“野草”。这种草的种子富含淀粉，足以果腹，且每年都能定期收获，填满粮仓。这，就是水稻。由此让钱塘大地的河姆渡人从渔猎中，逐渐看到了农耕的曙光。

到5300年前，良渚人在今杭州境内建立了一座城市，稻作已然是当时农业的重点。从良渚文明，到新世纪的稻香之乡，千年的稻米文化深刻影响着这片土地。

自此，中国人种植“五谷”，春华秋实，生生不息。农业物种几经兴衰，五谷的排序数度演变，但稻米始终居于五谷之首。

2014年8月间，我又来杭州，在朋友的热情引导下，去了趟浙大康源生态农场。大片的水稻试验田里种植的水稻正值灌浆期，那景象令我大为惊讶，这里的水稻竟与我在新疆看过的彩稻一样，除翠绿、暗红的颜色之外，还有嫩黄色的。更令人称奇的是，种植者还通过不同的颜色，展现出了清晰可辨的大禹治水、丘比特之箭、米娃娃等卡通图案。现场的一位水稻专家自豪地说，这是世界上首次采用种子直接播种的方式种出来的漫画图形。

那一刻，视觉中的稻米，竟触动了我舌尖的味蕾，这是自然而然的，有必然的因果关联。杭州的饮食文化历史悠久，一直以来被称作天堂美食之府，以稻米为食材的糕点也独树一帜。在曾经的“宋都”杭州，先人们用中原故土的面食工艺，加工本地稻米，制作米糕。明清时期，桂花米糕在江南地区逐渐流行。

将离开杭州了，请当地人推荐名糕点，准备带回新疆，几个不同的人，首推的皆是桂花米糕。

我也很喜欢桂花米糕，不仅是其味适口，还因其名的寓意，充分运用到了谐音，这是中国语言文化的一道风景，“桂”同“贵”，“糕”同“高”，意头绝佳。

钱塘稻米，香飘千年，在解决过我们五千年前先人饥饿的同时，还喂养过中华文明清澈的源头，而今更是穿越时空，继续用其母性的馨香，喂养着我们今天的心意。

“遍遍钱塘湖上山，归来文字带芳鲜”，我虽不能如此，但只想以难抑的富足，礼赞钱塘的稻米及其文化！



沾上
丛话

南湖的水 南湖的红船

吴建



江南的水，向来是有些灵气的。那水色既非北地黄河的浊黄，亦非南海的碧蓝，而是介于青白之间，泛着些微绿意，仿佛浸泡过无数新茶的汁液。嘉兴南湖的水，便是这般模样。水面不宽，却颇深，倒映着天光云影，也倒映着岸边的垂柳与游人。这水见过太多事——见过吴越之争的刀光剑影，见过南宋偏安的歌舞升平，见过明清南贾的舟楫往来，更见过1921年夏日里那只不起眼儿的游船。那船本是湖中千百游船之一，却因载了十几个青年人的理想，便成了后世指引中国迈向未来的“红船”。

南湖之水，恒常宁静。微风轻拂，仅激起层层细微波澜，随即复归平静。湖畔垂柳，枝条轻触水面，似在细语低吟，梳理着岁月的痕迹。这湖、这柳、这水，宛若时光回溯，百年未改。

我伫立岸边，凝视着湖心那艘仿制的红船。船身暗红，在阳光下更显庄严。低矮的船篷，仅能容纳十数人亲密围坐。船头船尾，朴素无华。正是这艘看似不起眼儿的小舟，却悄然扭转了一个民族的命运轨迹。

1921年7月，一群书生模样的青年，身着各异，从上海匆匆赶来嘉兴。他们或长衫马褂，或西装革履，或学生装扮，只为避开租界巡捕的耳目。他们登上南湖游船，借游湖之名，干开天辟地之大事。

船在湖中悠然前行。舱内，一位湖南口音的青年慷慨陈词，目光坚定如炬。旁侧，一位蓄须中年人频频颔首，不时插话。舱外，一女子端坐船尾，看似赏景，实则警觉环顾四周。湖面上，游船往来，欢声笑语，却无人知晓这艘平凡船只内正酝酿着何等壮举。

会议持续终日，直至夕阳西下，湖面金光閃

烁，他们终于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无欢呼，无鼓掌，唯有十几双手紧紧相握。那一刻，他们或许尚未意识到，自己已然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

而今，那艘承载着历史重托的红船，早已驶离南湖的怀抱，中国革命面貌亦焕然一新。船上那些曾热烈讨论的青年，有的成为革命领袖，叱咤风云；有的则在斗争中英勇牺牲。红船精神，随革命洪流，自南湖波及全国。

如今南湖，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湖边建起了纪念馆，立起了纪念碑，那艘红船也被复制出来。游人如织，拍照留念，热闹非凡。我独自在湖边漫步，这时的湖水清澈如镜，能看见水草摇曳，小鱼穿梭。恍惚间，似乎能看见那艘红船正从历史的迷雾中缓缓驶来，船上的青年们神情严肃又充满希望。

红船虽小，却引领大国航向。从南湖到井冈山，到延安，到西柏坡，最终抵达北京，航迹曲折却坚定不移。今日，我们仍需弘扬红船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我见过许多地方的水，但南湖的水确实与众不同。它不似西湖水那般被诗词歌赋装饰得过于精致，也不似长江水那般被历史重负压迫得喘不过气。南湖的水是平和的，却暗含力量；是静谧的，却孕育巨变。它默默见证了一个古老文明的转型时刻，又将那个时刻的精神，通过每一道波纹传递给后来者。

离开南湖之际，我再次回望那艘红船。夕阳映照下，它格外醒目。百年前那十几位青年或许未曾料到，他们的小船会成为巨轮先驱，而这艘巨轮正驶向更加广袤的海洋。红船，已超越历史范畴，成为永恒的精神象征，激励我们破浪前行。

识。戏曲内容年画，让众多进不了戏园子、去不了堂会听戏的人，也能受到文化熏陶，获得精神享受。

戏曲中一个独立剧目叫出，所以戏曲题材的年画也叫作戏出年画。

杨柳青戏出年画是中国民间木版年画中极精致的一个。2006年5月，杨柳青木版年画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杨柳青年画产生于元末明初，当时有一名长于雕刻的民间艺人避难来到杨柳青镇，逢年过节就刻些门神、灶王的画像出售，镇上的入争相购买。到了明永乐年间，大运河重新疏通，南方精致的纸张、水彩运到了杨柳青，使这里的绘画艺术得到了极大发展。

后来，戏曲题材进入杨柳青木版年画，尤其到了清光绪年间，天津戏园子演出梆子、皮黄“两下锅”，一时间京津戏曲演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局面。杨柳青的地理位置，去北京水路、陆路十分近便，于是，年画作坊老板便聘请画师随时到北京、天津的戏园子观摩演出实况，记下不同剧目的精彩场面、不同演员的舞台风貌，然后凭记忆进行创作。画师反复修改画稿后，由刻工刻成墨线版，再依画师要求刻出黄、绿、蓝、灰、紫、红多个套色版，精品还要加金版套印，有的还用手工开脸儿做色彩着色，成品画就像画笔重彩的写实绘画一样。

梆子、皮黄“两下锅”的热闹舞台景象，不仅成为绘制戏出年画的源泉，而且刺激了杨柳青戏出年画的销售市场，各个年画作坊的戏出年画，行销华北、东北及西北各地，远至内蒙古……随后各个分支画坊相继开业，所生产的戏出年画在北方各分省同样受到欢迎。戏出年画的角色、情节和绘画，传承着传统文化，可说是最有学问的年画之一，也是传统民间教育的精华。



应该是在1995年，那是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在我所服役的部队见到一位老者，是空降作家、电影《吉鸿昌》的编剧陈立德，我对军旅作家相对熟悉，但却并不识得此公之名，彼时他已年届花甲，笑容可掬，不善言辞。我仅20岁，举止青涩，双方无多谈资，与他仅打一照面，颌首略作招呼。

《吉鸿昌》这部电影是1979年向国庆30周年献礼的影片，放映之后，吉鸿昌这个人物几乎家喻户晓，该片也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奖，可见人心所向。那是我童年时代的英雄剧，我之所以了解吉鸿昌这位抗战英雄，全因这部电影。

我之前并不了解，这部电影的剧本早在1957年就创作完成了，它最初名叫《塞上忠魂》。1961年9月，剧本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电影文学》杂志刊登，电影厂随即组建团队，陈立德也赶赴长春修改剧本。但是随后受到一些阻挠，理由是旧军

恨不抗日死

杨仲达



人不应该宣扬，其实旧军人的弃暗投明，恰恰更值得宣扬。直到过了十几年之后，这部电影才在1977年重新上马，陈立德再赴长春重新修改剧本，电影文学剧本也先于电影在1978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读过这部剧本，故事紧凑且主题鲜明，它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紧紧围绕吉鸿昌思想发生转变、转而拥护共产党投身抗日这一主题。

后来细想，1957年还在原广州军区空军通信团服役的陈立德年仅22岁，他如何知晓吉鸿昌的大名呢？1953年，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吉鸿昌烈士签发纪念证，那一年，吉鸿昌的女儿吉瑞芝被选为天津市青年代表，参加了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吉鸿昌的影响力在持续扩大。陈立德在这部作品之前，并无与吉鸿昌相关的文学和传记作品出现，而胡红霞所写的小册子《吉鸿昌就义前后》，是1971年出版的。那么陈立德又是如何得知吉鸿昌这个人物的具体事迹史料，并倾注感情，把这部电影剧本写得有声有色的呢？

这说明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吉鸿昌这个人物已经广为人知，而此后的电影更是起到推动的作用。达奇饰演的吉鸿昌，身材魁梧，英姿勃勃，与吉鸿昌本人神似，这个形象影响深远的，对于我那一代人以及后来的很多人来说，是根植于心的，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电影上映时我正值垂髫，并不知道吉鸿昌和天津的深切关联。及长读书识字，渐知其在天津花园路的故居，知他被捕的国民饭店，以及后来在中心公园内竖起的横刀跃马的铜像等地标，了解由浅入深。我又读到他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情绪洒脱慨然，堪称佳作，直比谭嗣同的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而悲愤之情更深。与世界诀别之时，以树枝当笔，在雪地下写遗诗，该是多么从容镇定。而他给妻子胡红霞的绝笔，开篇即语：“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站位之高，极为通透，仿佛洞悉了历史般的直观。

我从部队回津之后，供职于档案部门，研究天津地方历史。我曾参与大型党史纪录片《曙光》的撰稿，并在表现吉鸿昌的《战旗》一集中作为主讲人出境讲述，当我面对镜头，站在“红楼”上向前遥望，时光恍然。那时“红楼”作为吉鸿昌的纪念馆正在腾迁修缮，尚未开放，楼上楼下一片空白，正好留下一段空间，给历史足够的沉思。因感受颇深，我在直播室的讲述投入了极真挚的感情，因而受到了吉鸿昌外孙女郑吉安的高度赞扬。

为统筹拍摄这部纪录片，我收集了大量资料，亦包括也是于1979年，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天津老作家周骥良撰写的长篇小说《吉鸿昌》。我曾有幸与周先生对话，当时采访他是为天津解放事，周先生已年过百岁，因他年事已高，故未能提及《吉鸿昌》的写作，也未及带上我手中的书请他签名。我有幸见过两位《吉鸿昌》的作者，都未能深谈，诚为憾事。作家眼中的吉鸿昌，普通人眼中的吉鸿昌，抑或党史研究者眼中的吉鸿昌，也许并不一样，然而他奋起救国而加入中国共产党，毁家纾难而建立同盟军并收复失地，运筹帷幄出版《民族战旗》，为抗日联络奔走而献出生命，如此等等，这些丰功伟绩，足以彪炳青史。

吉鸿昌所写“恨不抗日死”，是未能马革裹尸、醉卧沙场之意，但他终究是为抗日而死，他死于刑场之上面对射来的子弹，何其壮怀激烈！英雄死得其所，故而不会无声无息，而有敬仰其志者，甘愿为他竖立传流，流芳于后世，是谓精神不死。

过去，大多数人不识字，地方戏曲成为一种重要的口耳相传的教育形式。人们从看戏中学习有关历史、文化、人情的点点滴滴。戏曲演出本身受时空限制，而戏出年画相当于把舞台演出转化为可长久欣赏的平面艺术，每年一换的戏出年画可以常年伴随百姓，无形中起到启蒙教化、传播知识的效果。

清末民初，石印年画兴起，杨柳青年画生产日渐衰落。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杨柳青年画逐渐采用洋纸洋色，做工日渐粗糙，虽貌似红火热闹，但整个年画业已日趋衰落。年画在生产销售上均受到很大破坏，杨柳青年画随即搁置了发展，至新中国成立前几乎已濒于艺绝的境地。

新中国成立后，杨柳青年画重获新生，政府对年画的扶持和民间艺人对乡土艺术的诚挚感情，使得杨柳青年画枯木逢春，其知名度日益提高，杨柳青的年画作坊蓬勃发展起来。

渊源久远的杨柳青年画，在中国民间年画中具有重要的代表性。古老的杨柳青木版年画历经兴衰，在一代代传承人的执着守护下，至今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